



不炒作 网红儿童 用心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 士土绒

近日，中央文明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平台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服务，为16—18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

人们常常把这一代青少年儿童称为互联网的原住民，网生代，就是因为这一代孩子几乎从懂事开始就接触互联网。根据今年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目前，我国未成年

网民已达1.8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远高于成年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但是，会上网不代表能用好网。随着视频直播的兴起，许多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直播，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则成为网络主播，早早地开始了向“网红”进军的经历。

近年来，出现在舆论视野里的网红儿童，实属不少，其中不乏令人痛心的案例。2020年，3岁女童被喂到70斤做吃播，事件一度引发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质疑其父母不顾孩子的健康，把孩子喂到70斤是为了直播赚钱。前两年，多个视频平台上出现未成年人怀孕、生子的视频。一些未成年妈妈借怀孕成为网红，堂而皇之地宣扬早婚、早孕，却不知未成年

人结婚生子对身体有极大的损伤，并且这种行为还可能违法。但在猎奇心理的驱动下，未成年妈妈现象竟然吸引了大量的流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未成年人直播都如此极端甚至荒谬，在青少年网红中，也不乏积极向上的力量。但是，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尚不成熟，他们还无法很好地分辨是非。一方面，一些未成年主播沉浸在流量带来的虚荣中，却不关注自己播出的内容是否合法合规、符合公序良俗。另一方面，未成年网民很可能认识不到低俗不良视频的危害，反而感到同龄主播出人意料的内容所吸引，被感到新奇、好玩，甚至生出模仿之心。

此外，成年人利用孩子直播牟利、吸引流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乱象。目前，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75亿，占网民整体的94.5%。做网红、炒作网红，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职业选择。而孩子天真可爱的特点，在直播中有着特别的优势，为了吸引流量，部分炒作者罔顾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和利益，甚至有人制作传播涉及未成年人软色情内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也扰乱了互联网生态。而被卷入直播浪潮的青少年儿童，或者意识不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无能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需要与时俱

进。如何引导孩子们用好网、如何为他们打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应该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要课题。鼓励未成年人当主播、炒作网红儿童，很可能给孩子的健康成长带来危害。而仅仅靠行业自律、家庭保护，无法杜绝这种侵害的可能。因此，相关主管部门及时出手，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就是看到了这一涉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方面，从根本上为未成年人“撑腰”。

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应该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上网、善于用网，最大程度发挥网络的正面作用，减少网络的负面影响。不炒作网红儿童，才能让互联网时代的孩子健康成长。

封控的焦虑中 守护好心理绿码

□ 涂 格

近段时间，由于抗疫需要，不少小区、街道甚至城市遭遇了封控。封控的时间一久，不少人就产生了心理问题。毕竟是群居动物，偶尔独处可视为一种放空，但长期封控却可能带来紧张、焦虑、孤独、恐惧等一系列负面情绪。谁都不希望被封控、被隔离，但特殊时期，万一遭遇这种情况，还是得苦中作乐，做好心理建设，避免出现心理绿码。

好在，现在有互联网，没事跟家人通个视频，或者在各种群里和人聊聊天，多少也能排解一些孤独感。只是这种线上社交也要适度，避免因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带来负面情绪。同时在网络社交之外，给自己找点事来做，这样多少可以分散、转移注意力。

前阵子，我有几个朋友被隔离，其中有人热衷健身，就天天在房间做深蹲、平板支撑等室内项目，并将健身过程拍成视频，传到网上，活脱脱一个女版刘畊宏。两周之后，不仅身体没一点问题，还学会了视频剪辑。还有一位插画师朋友，更是在隔离期间创作了好几幅画作。

除此以外，认真工作也是分散注意力、排解心理焦虑的一种办法。如今，在线办公系统已经非常发达，在单位和居家或者在隔离点办公，区别还真不大。事实上，人一旦有事做，忙碌起来，会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像我自己，从4月23日居住地遭遇封控开始，已有近20天没迈出小区大门了。一周前小区解封，我发现自己依然忙于工作，根本没空出门溜达。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不是所有人都通过各种方式缓解焦虑。如果恐惧、无助、无望、空虚、迟钝与麻木等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始终难以排解，就应该及时拨打心理咨询热线，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

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人对精神疾病不太重视，也很忌讳看心理医生。然而，现代快节奏那么快，压力那么大，不少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心理问题，讳疾忌医，只会加剧病症。特别是在抗疫特殊时期，由于长时间封控，无论是被隔离对象，还是防疫工作人员，精神压力都很大。这就更需要做好心理防护工作，尽量避免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对此，我建议各地政府还要注重民众的心理防疫问题，尽可能为封控小区配备专业的心理医生，对小区居民和防疫人员进行及时、必要的心理疏导，缓解心理压力。如此，才能更好地将防疫工作进行到底。



爽 约

数年前，一些大城市打响抢人大战，第一轮，很快蔓延至全国各地，乃至下沉到诸多县级城市。随后，一些地方出现难以按时兑现人才引进承诺的问题。倘若中小城市继续通过政策攀比来抢人，显然是把自己置于恶性竞争的不利境地，结果也只能一时之爽快。陷后于人尴尬。（光明日报）5月10日）

漫画 徐 简

退出排名并不意味着排斥国际交流

□ 杨朝清

近日，据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决定不再参加国际排名。南京大学此前也明确，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兰州大学相关工作人士表示，该校未参加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之前给QS排名报过一年数据，后来应该没有再跟进。

五花八门的大学排名，以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为核心的教育评价方式，加重了高校的负担，助长了学校办学的急功近利。当国际排名成为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关键词，一些高校为了提高国际排名，穷尽手段，忽略学校、学科的实际状况，让办学定位摇摆不定。

要使大学教育真正破五唯，就必须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不同的高校、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办学历史、学科实力和地方特色，不能一刀切。只有让教育评价指挥棒

更加科学有效，才能确保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正确航向。

不过，一些高校宣布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以后，同时引发人们的担心和焦虑：不参加国际排名，高校之间的竞争如何遵循教育本质？需要明确的是，退出国际大学排名并不意味着排斥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而是打破对榜单的迷恋和依赖，扬长避短、有所取舍，逐步完善和优化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认同的教育评价体系。

如果生搬硬套一些国际大学排名量化的指标体系，如教师中博士学位占比、国际学生比例、师生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比例等，很容易导致高校办学不接地气，虽然围绕着量化指标，提升国际排名的成绩可能立竿见影，但如果学校因此走上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内涵的畸形繁荣道路，显然背离了师生期望和公众期待。

任何一个大学排名，都难以全方位衡量出一所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作出的

所有贡献。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大学排名，我们既不能照单全收，也不能自弹自唱、孤芳自赏，可以从学校实际出发，有针对性 and 前瞻性地选取部分指标和数据，作为办学治校的一种参考。

如何对高校进行教育评价，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和实践性难题。退出国际大学排名并不意味着不要外部评价，而是要逐渐改进和优化教育评价方式。教育评价不能依赖量化指标，而是需要定量与定性有机结合，采用分类评价、增值评价、过程评价、长周期评价、综合评价等多元化评价方式，努力实现教育评价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精准化。

非新无以为进，追寻世界一流的脚步始终不能停歇。高校与其被排名左右，还不如增强学科建设自信 and 办学定力，把精力和重心聚焦到优势领域、特色方向的创新与突破上。只有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才能充分激发内生动力和办学活力，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才会迈上新台阶。

劳动教育不只是 教学生做西红柿炒鸡蛋

□ 姚华松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标准》），明确将劳动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及服务性劳动，并根据不同学段设置不同的实践内容和要求。

劳动对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而言，是儿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6岁起，每天放学回家，我的身份便转换为家里的重要劳力，做饭、洗碗、挑水、浇园、放牛、砍柴等家务，基本被我和弟弟包了。农忙时节，父母干犁田、耙田、挑谷子等重活，我就帮家里翻稻、插秧、捡棉花等。小学三年级至五年级，学校每个月都有一天安排的是劳动课，一般会去5公里外的山里采茶叶。总之，劳动是那个年代农村孩子的必备技能。

时过境迁，现在的孩子与劳动尤其体力劳动渐行渐远。在农村，大量人口进城务工，除了老人还在坚持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很多农田都荒废了，孩子自然鲜有机会接触农活；在城里，孩子们大多忙于各种学习，偶一时兴起，想参与一些家务劳动，不少家长经常阻止说：“你好好学习、好好玩，这些我来做。这个你不够力气拿，我来吧。”

劳动让位于理论学习，是人们的普遍认知。殊不知，知识构成很复杂，除了来自书本，很多还源于劳动实践。一个不参加劳动、不会照顾自己的人，日后生活难免碰壁。长期不劳动或远离劳动，还可能剥夺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错失观察、分析真实社会的宝贵机会。重视劳动课的意义，在于让孩子在

德智体美劳五方面齐头并进，五育并举，而不是只会读书与考试，进而从容面对人生道路上的风雨与坎坷。

我注意到，《标准》对各年龄层次学生的学段目标进行了详细设定，比如烹饪与营养方面，5—6年级的学生要用简单的炒、煎、炖等烹饪方法制作2—3道家常菜，如西红柿炒鸡蛋、煎鸡蛋、炖骨头汤等，参与从择菜、洗菜到烧菜、装盘的完整过程。这样的具体规定看似有操作难度，但菜汤的出品与味道如何，应该是其次的，重点在于让孩子体验劳动过程。

需要提出，各地对《标准》的执行与实施不宜过分地机械复制与照本宣科，而应将劳动进行本地转化，将劳动与地方特色、社区产业、民俗与传统等进行有效融合，多鼓励开展一些因地制宜、联结社区的劳动与实践。

在我生活的广州，有学校邀请周边医院的医护人员教学生用中药做美白、祛斑、祛痘面膜；有学校邀请海洋科学家指导学生制作各式各样的贝壳摆件，带领大家去海滩捡拾垃圾，用实际行动保护海洋环境；还有学校将劳动课与饮食文化进行有效结合，部分2—3年级学生对猪脚饭、鸡脚饭、鲫鱼醋等地方美食的制作流程如数家珍，不少高年级同学早已是家里的大厨了。

总之，鉴于不同地方办学条件不同，不同学校的资源禀赋各异，各地在具体推进与实施劳动教育过程中，除了完成规定动作，可以根据自身条件与地方特点，创新性地推进劳动教育，使其与区域基础及社区文化有机融合，做到不拘一格，百花齐放。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严治山寨机构 别再迷恋证书为王

□ 朱昌俊

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近日声明，江苏英才职业技能鉴定有限责任公司以JYPC全国职业资格考证认证中心名义颁发注册职业资格证书，不属于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该机构也不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

在考证热之下，一些市场乱象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考一个易学风水师要3万多元，花两万元能考武器工程师。但业内人士透露，所谓武器工程师资格证书就是一张废纸，没有任何单位、机构会凭此招聘用人。说白了，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证书不过都是山寨的，既无法律效力，也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

日前，相关部门查处的两个与职业资格培训相关的山寨网站，都是对正规网站的翻版，表面看来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甚至，有的机构还堂而皇之地借人社部清理山寨证书专项治理提高了收费标准。这表明，不能低估相关治理的复杂性和一些机构的侥幸心理，个人也需要对五花八门的考证市场多留个心眼儿，避免盲目考证。

随着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相信更多的山寨机构和山寨证书将现出原形。但是，在当前的环境下，相关治理还需要常态化。一方面，在校外培训机构遭遇整治后，一部分机构转型为职业教育培训，这个赛道可谓越来越热，其中是否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乱象，包括违规发放不具备法律效力职业资格证书，值得警惕。对于相关边界，需要相关部门依据

现实情况给予及时厘清。如此既有利于促进校外培训机构的顺利转型，也可减少考证者上当受骗。

另一方面，职业资格考证和颁证居然衍生出一个不可小觑的灰色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非理性的考证热依然存在。如媒体报道，一些大学生在校期间就是忙着不断考证，甚至有大学生4年狂揽65个证书。近些年，随着相关改革的推进，一大批职业资格被取消，但是，一些机构仍在利用信息不对称，继续批量发放已被取消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巧立名目，发明一些新的职业资格证书。对此，推进相关治理当然很有必要，但也不能非理性的考证热降温，别再迷恋证书为王了，如此才能少入坑。

此外，也应该倡导用人单位在招聘、选人时，减少对证书的依赖，给予求职者更为明确的预期。同时，企业作为用人的主体，更加了解选人用人的实际，在自主开展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有着诸多的优势，对此，应该进一步为企业自主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目前，人社部证书已表示，通过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获得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在人社部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查询，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享受同等待遇。

总之，面对禁而不绝的山寨证书，既需要相关治理的持续深化，也有赖于社会对考证建立更理性的认知，避免盲目跟风，同时也需要创新人才评价体系，让更多的用人企业积极参与到职业评价中来。如此多管齐下，才能最大程度保障职业技能等级评定的务实化，让山寨证书和山寨机构失去市场。

尊重感染者从体面的称呼做起

□ 任冠青

对面楼清羊了，今天小区惊现3个“小阳人”，两只小羊统统消毒。最近，全国多地出现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网络上对感染者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戏谑地将感染者称为“小阳人”“羊”，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新表述。比如，将感染者转移至方舱称为“抓羊”“牵羊”，把向封控楼运送物资叫做“投喂”等。

对此，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调侃，不必太语言洁癖，很多使用这些称呼的人也只是一时跟风，并无恶意。但是，称呼本身即能代表一种看法、一种态度，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被称呼者在社会中的处境。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阐释的，某些针对传染病的修辞方式的确会对社会产生

消极影响。具体到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而言，则关系到他们能否被尊重、被善待，是否会被排挤、不满等情绪伤害。因此，严肃地审视针对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等诸多修辞是否妥当、是否道德，绝不是小问题大做。

为了及时阻断病毒传播，实现精准防控，确实有必要对居民进行医学概念上的区分，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也有义务配合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但是，若是在社会层面戏称他们为“小阳人”“羊”等，则存在污名化感染者的风险。一方面，这些指称过度放大了感染者这一身份，很容易遮蔽其作为普通公民的其他面向。要知道，他们并不是疫情统计表中的一个冰冷数字，而是本该在校园里自由活泼的学生，在工地上正常工作的上班族，能够与父母时常见面的儿女。他们本身也是无辜的受害者，也有着丰富的情感和合理的需求，感染后

更是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此时，他们更需要的是关怀、帮助，而不是被冷漠、戏谑地指称为“羊”。

另一方面，各种污名化、物化感染者的说法，暗含着一种划界、歧视的疏远态度。动辄用“小阳人”“几只羊”等语称呼感染者，也是将其划为与我们不同的他者。语言的调侃可能变成现实的枷锁，这种歧视性指称，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感染者在现实中遇到的困难。在语言的暗示作用下，一旦被贴上“羊”的标签，感染者就容易被疏离、被另眼相待，甚至遭遇社会性死亡，难以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需要的是温情的团结互助，而不是人为制造隔阂。前段时间，一段播客内容让我深有感触，有位嘉宾分享道：在观察过小区邻居对阳性病人的态度后，自己感到很

免费穿衣还能拿高薪？小心试衣员 兼职陷阱

□ 林 笙

成为试衣员，轻松月入上万，还能免费收各种快递。最近，一些试衣员兼职广告在网络平台传播，好评如潮，商家纷纷由兼职人员拍照给好评，而商家给兼职人员结算佣金，或者把衣服直接送给兼职人员。

据媒体报道，这样的兼职合作看似双赢，实则埋有各种隐患。有的试衣员平台要求兼职者先交会费，交了会费还会被

要求强制拉人头，有的试衣员在兼职过程中被收集个人信息，甚至稀里糊涂开通了网贷，还有商家推诿佣金结算时间。总而言之，没有从天而降的馅饼，试衣员兼职远远没有商家宣传得那么诱人且简便。

当互联网电商逐渐取代传统线下购物，缺失的体验感需要补充。试衣员的工作，就是替消费者试穿衣服，代为体验并提供评测。然而，试衣员要获得兼职收入，打好评是前提。这种刷单式的商品评测，本身就违背了市场诚信原则，更破坏了网络消费的透明性。

为了整治网络购物刷单，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有关部门频出大招。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刷单炒信乱象，查处并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努力铲除刷单公司、水军、刷手等黑灰产业链条。商家雇用试衣员刷好评，本质上是一种虚假交易，市场监管部门和平台理应联手打击，挤掉服装销售领域的泡沫。

衣服不合身，穿到身上才知道。平心而论，消费者对试衣的体验式评测有着客观需求，相比身材好的专业模特，消费者也更希望看到素人穿上衣服怎么样，从而作出

符合自身预期的消费决策。但是，提供试穿的不应该是从事销售的商家。顺应市场需求，一些第三方评测机构以公允的立场、专业的分析受到消费者认可。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杜绝虚假营销，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的力量，让真实评测获得更多展示。

当下，网络兼职泥沙俱下，一些不法商家瞄准兼职者维权意愿弱、嫌麻烦的心态，习惯性地给出虚假承诺，当出现劳动纠纷时就烂尾甚至玩消失。对此，兼职人员也要提高警惕，认清网络刷单实质，合理合法维权，防止自己被不法商家所利用。